

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时空演变及其 与城镇化响应分析

卢飞¹ 张红²¹

(1. 潍坊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41;

2.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服务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3)

【摘要】：基于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 2001—2019 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旅游化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PVAR 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时空演变轨迹及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 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已进入稳步推进阶段，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发展差异明显。(2) 旅游化热点区域先增加后减少，空间集聚显著，重心逐渐向长三角沿海城市转移。(3) 两者关系总体上表现为旅游化具有依赖自身发展的惯性特征，受城镇化的影响较弱。(4) 环渤海和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泛珠三角沿海城市仅表现为单向互动，旅游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旅游化 城镇化 时空演变 互动响应 沿海城市

【中图分类号】：F5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22)03-0376-09

在后工业时代，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广、带动性大等特征愈加凸显，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验成果和旅游实践发现，旅游化成为未来更长时间内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和战略选择。旅游化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旅游业的成长发展而出现的，学者们就其概念内涵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大体上可以分为“影响说”和“过程说”两种。其中，“影响说”侧重于旅游影响，这是 Young 最早提出旅游化概念的初衷^[1]，此后，Jansen-Verbeke 明确指出旅游化是“旅游系统不断增长的影响”^[2]；“过程说”则强调旅游作为驱动力发挥影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起始点是旅游消费需求^[3]。

从需求出发，旅游活动经由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农业、工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简言之，旅游化是在旅游活动顺利进行、旅游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上，通过叠加效应使得旅游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并不断提升人们美好生活品质的过程。旅游化不仅是一种现象和过程，更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和生活方式^[4]。前期有关旅游化概念界定并未得出普遍认同的结论，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各有侧重，或关注资源旅游化利用^[5,6]，或强调区域旅游化发展^[7,8,9]。

旅游业对外部环境十分敏感，而城镇化作为旅游化的宏观背景必然会对旅游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逐渐向城镇转移的过程^[10]，由城镇化衍生的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变迁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消费模式^[11]，提高旅游消费

作者简介：卢飞（1983-），男，江苏省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区域发展战略。张红（1993-），女，安徽省安庆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编号：2021-YYGL-33）；潍坊学院博士基金项目（编号：2021BS43）；潍坊市软科学课题（编号：2021RKX145）

水平, 增强旅游业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 从而推进旅游化发展演化。同时, 旅游化所释放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 也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语境下越来越强的驱动力量^[12]。然而, 现实中旅游城市存在很多弊端, 如片面追求景区规模扩张, 较少关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13]。因此, 旅游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交互作用问题值得关注。现有研究已对旅游化和城镇化响应、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探讨, 且对于两者关系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其中, 麻学峰、孙根年、王新越等学者为开拓和丰富相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4, 15, 16]。但前期基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研究忽视了旅游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的动态交互作用, 侧重强调城镇化对旅游化单向响应强度。

总体上来看, 现有研究中仅有少数涉及旅游化和城镇化两系统间的互动作用^[17, 18]。研究对象上, 以宏观省域居多, 较少涉及区域城市层面; 研究方法上, 多采用回归模型、耦合模型等方法; 旅游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方面, 现有研究多通过指标体系构建等方式定量测度旅游化水平, 揭示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地理时空视角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勾勒其演化路径的成果较少。鉴于此, 本文以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为研究对象, 在测度旅游化水平基础上,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刻画其时空演变路径, 并进一步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 (PVAR) 模型探析旅游化和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 为推动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区特征、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特征

沿海城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人才集聚密度最高的优势区域。自 1984 年开始, 国务院先后通过设置沿海开放城市和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等形式, 在扩大地方权限、引进外资、吸引人才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为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空前机遇。沿海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重要战略区域已经跃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发达和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区和示范区。同时, 沿海城市凭借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率先发展旅游业, 基本上形成了以重点旅游城市、旅游口岸城市和滨海城市为中心的旅游产业聚集区, 成为我国旅游产业格局的核心区域^[19, 20]。有利的政策条件、产业基础为沿海城市城镇化和旅游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使得沿海城市城镇化稳步推进, 旅游化趋势愈加明显。经过多年发展, 如今沿海城市正处于旅游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时期, 系统梳理和勾勒旅游化时空演变过程, 厘清旅游化和城镇化动态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同时, 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沿海城市旅游化和城镇化水平高于内陆城市, 因此研究沿海城市旅游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 探析旅游化和城镇化交互响应, 不但对沿海城市旅游化进程顺利推进、旅游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中西部城市未来旅游化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考虑到旅游化是长期动态变化过程, 本文最终选取 2001—2019 年这一时间段对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进行研究。

1.2 研究方法

旅游化、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 旅游化作为一种现象和过程已经成为旅游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 同时也是旅游资源丰富型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由于旅游化概念内涵不确定, 导致在旅游化测度方面存在单指标法和多指标法的差异。单指标法多采用旅游收入指标表征旅游化水平, 认为旅游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等效益最终都通过收入变化来表现^[21]。多指标法则从旅游功能出发综合评价旅游化水平^[22]。旅游化过程是旅游系统演变的过程, 其影响既表现为旅游系统本身在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方面的变化, 同时也表现在外部社会影响, 即旅游社会功能。因此, 本文采用多指标法选取旅游产业规模、旅游经济效应等一级指标构建旅游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为正确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和真实态势, 科学测度城镇化水平至关重要。自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 传统以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单一指标的方法逐渐被涵盖社会、经济、生态等的综合指标体系所取代, 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的高要求和全面导向。综合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现有研究成果, 拟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活方式 5 个方面构建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为避免主观性,本文借助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线性加权法计算旅游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参考相关文献^[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主要功能是让数据来表现自身,探索空间数据的分布特征^[24],其目的在于探究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空间集聚状态,揭示其空间演化格局。本文主要借助 ArcGIS10.2 热点分析工具,采用 Getis - Ord G_i^* 统计指数法对沿海城市旅游化热点、冷点区域及其演变情况进行了空间探索。

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在刻画地理属性值空间布局情况上具有较好效果,可直观地呈现出分布中心、方向和形态。沿海城市旅游化演变过程中,旅游化是否存在中心转移、方向改变等问题对于揭示旅游化演化规律,促进沿海城市旅游化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心模型:旅游化演变过程是系统各要素在时空上集聚、扩散的动态过程,即系统中各要素的重心在不断发生转移。借助重心模型分析旅游化系统中一级指标系统的空间运动轨迹,以客观呈现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动态演化过程,揭示其空间均衡性和差异性特征。具体测算模型参考相关文献^[25]。

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PVAR 模型主要是通过回归模拟、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过程探测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脉冲响应可分析来自系统中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响应程度,从而直观描述变量间的动态交互情况;方差分解能进一步分解冲击的变化贡献程度和解释力度^[18]。基于此,在构建 PVAR 模型的基础上主要使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辨识沿海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效应、冲击效应和贡献程度。构建 PVAR 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sum_{j=1}^n \alpha_j Y_{it-j} + \beta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cdots \cdots \cdots (1)$$

式中, Y_{it} 为包含旅游化和城镇化的二维列向量,取对数后分别用 $\ln t$ 和 $\ln ur$ 表示; i 表示城市; t 表示时间; n 为滞后阶数; α_0 为截距项; α_j 为滞后 j 阶的参数矩阵; β_i 表示城市效应的列向量,反映截面个体差异性; η_t 表示时间效应的列向量,反映时间序列差异性;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02—2020 年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部分缺失值采取简单移动平均法补齐。需要说明的是,三亚市旅游收入统计口径较为宽泛,导致旅游收入大于第三产业产值,因此在衡量旅游化系统中旅游产业地位指标时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表示。

2 旅游化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2.1 总体性特征

根据熵值法客观赋权结果,运用综合线性加权法测算 53 个沿海城市 2001—2019 年旅游化水平。(1)从时间序列来看(图 1),研究期内沿海城市旅游化整体水平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由 2001 年的 18.97 上升至 2019 年的 87.65,增长了近 5 倍。研究期内,沿海城市旅游化快速推进,年均增长率高达 9%。2010 年之前,沿海城市旅游化保持较高发展速度,但 2003 年受非典影响呈负增长;2011 年开始,沿海城市旅游化进程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旅游化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更加侧重旅游化质量提升。(2)在空间分布上,结合上述旅游化整体变化情况,选择 2001 年、2010 年和 2019 年 3 个时间截面,观察分析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空间分布变化。由图 2 可知,研究期内我国沿海 53 个城市旅游化水平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天津、上海、杭州、深圳、

广州等城市旅游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大部分城市增长幅度较小，城市间发展差异显著。2019 年，以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 19 个城市旅游化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值，处于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第一梯队。从所属地区来看，以上海、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在研究期内增长趋势明显。其中，上海保持旅游化程度最高地位，温州、绍兴等城市跃升为中高等水平。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沿海城市，虽然广州、深圳两市旅游化进程持续稳定推进，但是大部分城市旅游化进程明显速度放缓，旅游化水平整体落后于长三角。以天津、青岛、大连为代表的环渤海沿海城市和以厦门为代表的海峡西岸旅游化水平稳步提升。而以三亚为代表的北部湾沿海城市虽然拥有众多旅游资源，但是限于地方经济、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限制了旅游化进程缓慢，其中，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更是长期持久的过程。整体上，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快速发展、水平较高，珠三角沿海城市次之，环渤海和海峡西岸沿海城市旅游化稳定提升，而北部湾沿海城市旅游化程度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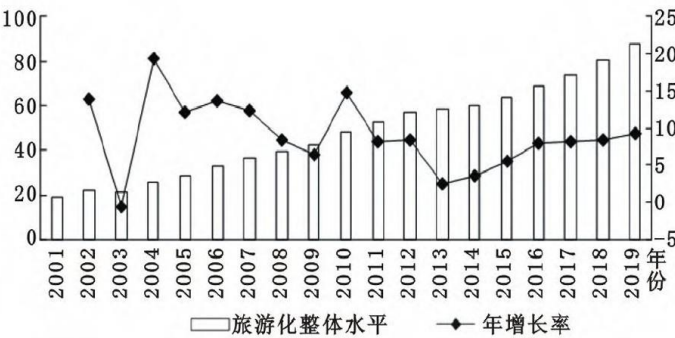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9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及增长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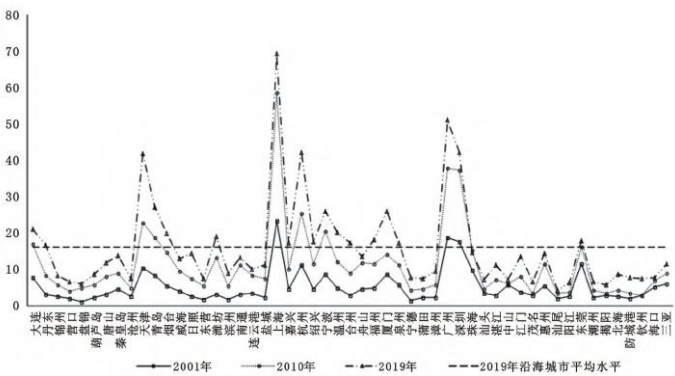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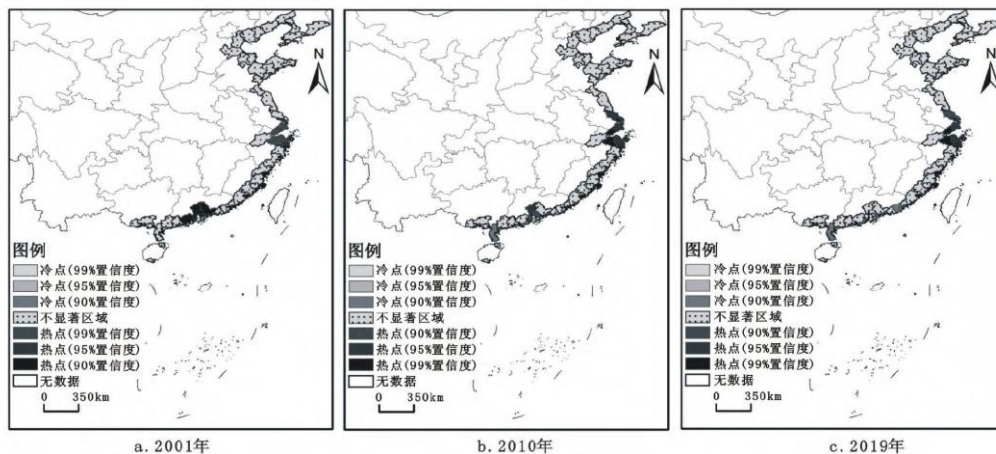


图 2 53 个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变化（2001 年、2010 年、2019 年）

2.2 旅游化时空演变轨迹

热点分析：本文借助 ArcGIS10.2 热点分析工具，对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进行热点分析，以探究沿海城市旅游化空间异质性。由图 3 可知，2001 年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集中在两个热点区域。其中，较小热点区域位于长三角地区，热点城市分别为上海、嘉兴和南通；较大热点区域位于珠三角地区，热点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2001—2010 年，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快速发展，热点区域进一步扩大。相反，珠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进程逐渐缓慢，热点区域范围有所缩小。截至 2019 年，这一趋势愈加明显，表现为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热点区域基本保持，而珠三角沿海城市热点区域则缩小为仅广州，并形成了汕头和揭阳冷点区域。整体上，沿海城市旅游化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沿海城市，并呈现出旅游化热点区域向长三角转移现象，而环渤海、海峡西岸和北部湾沿海城市尚未形成显著的旅游化冷热点集中区。



注:审图号为 GS(2016)2556 号,根据全国地理信息资源服务系统绘制,底图无修改,图 4 同。

图 3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热点分布

标准差椭圆分布: 本文运用 ArcGIS10.2 正向分析工具进行相关处理,得到我国沿海城市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 3 个时间截面的旅游化标准差椭圆分布(图 4)。从椭圆中心看,整体呈沿东北方向向北转移趋势,2019 年椭圆中心落于浙皖赣 3 省交界。究其原因,是因为长三角地区具有经济环境和资源禀赋双重优势,加之政策推动,沿海城市旅游化快速发展。由椭圆方向可见,2001 年总体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2001—2010 年椭圆方位角由 27.057° 变为 25.559° ,说明该时期内旅游化分布走向有向东偏移的趋势,这是因为经度偏东的上海、嘉兴等城市旅游化水平快速提高。2010—2019 年变化幅度较小,空间布局仍以南北方向为主导,东西方向影响较弱,但标准差椭圆范围较 2001 年明显缩小,说明沿海城市旅游化在空间上更加集聚。

重心变化: 本文根据 53 个沿海城市地理坐标及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旅游化水平数据,参考文献重心模型^[23],得出 3 个时间节点旅游化整体重心、产业规模重心、经济效应重心和社会功能重心位置。由图 5 可见,2001—2010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整体重心向东北偏移;2010—2019 年旅游化整体重心继续向东北方向偏移,但偏移幅度较小。结合坐标地理位置可知,2001 年以来沿海城市旅游化整体重心持续向长三角沿海城市转移,以上海、杭州为核心的沿海城市已成为区域旅游化重心;2010 年之后,旅游化整体重心基本维持在长三角区域,说明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呈稳步提升状态。具体的,产业规模重心经度在研究期内由 119.42° E 变为 118.89° E ,呈向西转移趋势,这与旅游产业规模逐渐向内陆扩张和空间溢出效应密切相关。经济效应是旅游业发展的首要和突出特征,与产业规模重心类似,同样表现为向西偏移;社会功能重心表现出向东北方向转移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功能重心较产业规模重心和经济效应重心位置偏西,这是因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沿海城市整体位置偏西,同时其旅游化程度最高、旅游社会功能相对完善。

3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响应分析

前述研究发现,研究期内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旅游化虽然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城市间存在发展差距、空间分布上向长三角沿海城市集聚。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旅游化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沿海城市新型城镇化也在持续推进,旅游化与城镇化间的动态作用将直接关系沿海城市城镇化建设及旅游化发展。一方面,城镇化是旅游化基础,为旅游化提供地域载体、客源市场和产业要素;另一方面,旅游化发展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城镇化水平提升。简言之,旅游化和城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结合前文沿海城市旅游化空间格局演化,将 53 个沿海城市划分为环渤海、长三角和泛珠三角 3 个区域,进一步在旅游化和城镇化测度基础上,运用公式(1)构建的 PVAR 模型探究旅游化和城镇化动态关系和区域差异,并分析其作用机理。

3.1 相关检验

首先，对模型中 $\ln t$ 和 $\ln ur$ 两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按照全面性原则，综合采用 ADF 检验、IPS 检验和 LLC 检验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数据均强烈拒绝原假设，即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

随后，在平稳性检验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考察 $\ln t$ 、 $\ln ur$ 两序列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里运用 kao 检验方法，结果显示 ADF 值分别为 -5.146、-4.400、-5.382 和 -5.370，均在 1% 显著水平上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可进行 PVAR 模型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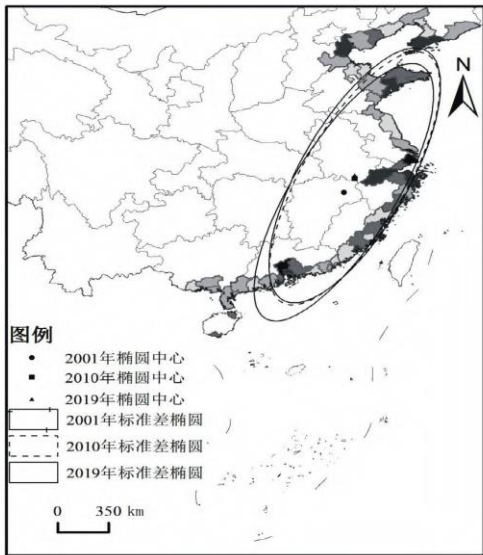


图 4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标准差椭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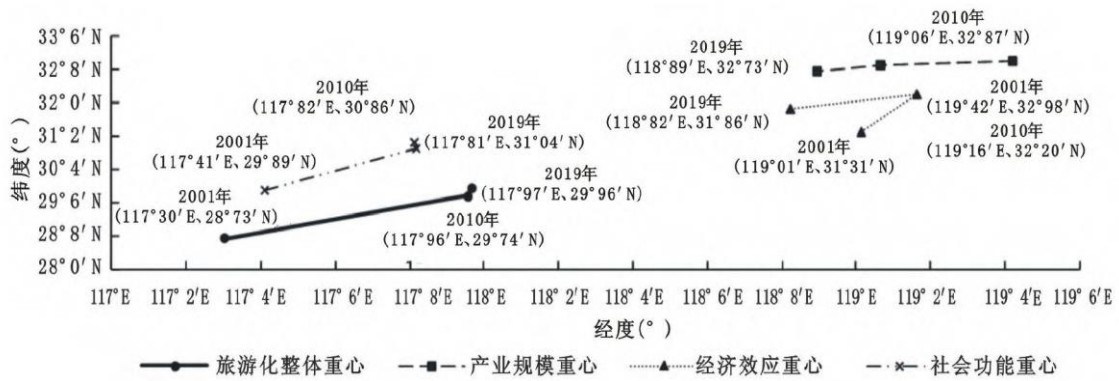


图 5 2001 年、2010 年、2019 年沿海城市旅游化重心变化

3.2 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 BIC、AIC 和 QIC 值最小原则确定 PVAR 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 1，在此基础上进行 GMM 估计。其中， L 表示滞后一期的变量。对 53 个沿海城市而言，当被解释变量为旅游化 ($\ln t$) 时，滞后一期的旅游化 ($L \ln t$) 对其自身的影响为 1.011，且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滞后一期的城镇化 ($L \ln ur$) 变量影响不显著。另外，环渤海、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沿海城市也呈现同样特征，即旅游化滞后一期对自身的影响较大。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 ($\ln ur$) 时，旅游化滞后一期的影响系数为 0.415，城镇

化滞后一期的影响系数为 0.583，皆通过显著性检验；环渤海沿海城市城镇化依靠自身发展的情况较为明显，城镇化滞后一期的影响系数为 0.953；长三角沿海城市滞后一期的旅游化和城镇化系数分别为 0.184 和 0.738，滞后一期旅游化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泛珠三角沿海城市相关系数与研究区域整体情况一致。总体来看，沿海城市旅游化和城镇化虽然都具有依赖自身惯性发展的特征，但是旅游化更加明显。

在此基础上，借助脉冲响应函数细致刻画旅游化和城镇化间的互动关系。采用蒙特卡罗 1000 次模拟定义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差，设置冲击响应期为 10 期，分别得到 53 个沿海城市、环渤海沿海城市、长三角沿海城市和泛珠三角沿海城市脉冲响应函数图（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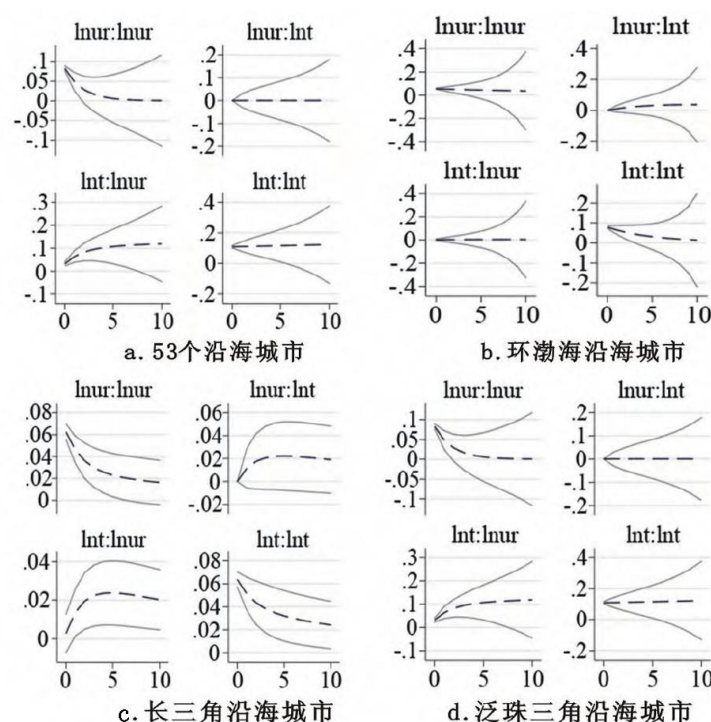


图 6 沿海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脉冲响应关系

53 个沿海城市：从图 6a 可知，沿海城市旅游化对自身冲击的脉冲响应（ $\lnr:\lnr$ ）是正向的，且几乎维持为 1，城镇化对旅游化冲击（ $\lnur:\lnr$ ）影响甚微，表明旅游化具有极强的依赖自身发展惯性；城镇化对自身冲击（ $\lnur:\lnur$ ）影响相对较弱，随着时间推移趋向于 0，而旅游化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lnr:\lnur$ ）逐期增强。我国沿海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现实中已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旅游产业体系，旅游化系统从需求端到供给端基本实现了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早期沿海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模式尚未完全转变，导致对旅游化的推动作用稍显不足。相反旅游化带来的产业融合、城镇建设、环境改善等能为城镇化转型升级提供重要驱动力，具体表现在城镇化受到旅游化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响应值均大于 0，且呈逐渐扩大趋势。

环渤海沿海城市：从图 6b 可知，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化对自身冲击的响应同样是正向的，且冲击效用在第 1 期时达到最大，随后不断减弱。从第 7 期开始，这种冲击效应趋近于 0。城镇化对旅游化的冲击效应大于 0 且逐渐增强，而旅游化对城镇化冲击作用始终徘徊在 0 值附近，正向促进作用较小。从旅游产业发展来说，环渤海沿海城市相较于其他沿海城市实力较弱，辽东南沿海城市尤为明显，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区域城镇化水平。因此，区域旅游化发展要多依赖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契机和条件。

长三角沿海城市：从图 6c 可知，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对自身具有正向冲击影响，当期影响最大，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城镇化对旅游化冲击作用先增加，第 5 期开始逐渐减弱，后维持在 0.02 值附近。在受到旅游化冲击后，城镇化响应值先增加后减小，整体呈倒“V”趋势。这一冲击路径与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和城镇化互动模式相符。旅游化进程快速推进首先会反映到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和社会功能上，从而推动旅游化进一步提升，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惯性会逐渐减弱。而城镇化建设日益完善、水平逐渐提高将逐步反射到旅游化上，推动旅游化持久稳定发展。

泛珠三角沿海城市：泛珠三角沿海城市个数占总沿海城市的比重为 47%，是我国沿海城市的重要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沿海城市整体特征。从图 6d 可知，其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响应关系与 53 个沿海城市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3.3 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内生变量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程度，可借助方差分解客观评价不同内生变量重要性。本文在脉冲响应基础上，对旅游化和城镇化进行了方差分解。从旅游化方差分解结果来看，53 个沿海城市与 3 个细分区域均呈现出第 1 期对自身贡献率为 100%，但后期贡献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环渤海和长三角沿海城市从第 2 期开始逐渐下降，至第 10 期分别下降至 70.74% 和 81.07%，而泛珠三角沿海城市则保持 100%。相应的，环渤海和长三角沿海城市城镇化对旅游化贡献率逐渐增加，由第 1 期的 0 分别上升至第 10 期的 29.26% 和 18.93%。简言之，以泛珠三角沿海城市为代表的沿海城市整体旅游化发展主要来源于自身影响，而城镇化对旅游化影响微乎其微，但环渤海和长三角沿海城市城镇化促进旅游化发展的驱动力量持续稳定增强。从城镇化方差分解结果来看，53 个沿海城市城镇化对自身贡献率逐渐减小，末期贡献率为 10.02%，同时旅游化对城镇化贡献率增长至 89.89%。需要注意的是，环渤海沿海城市城镇化主要受自身发展影响，各期旅游化贡献率皆不超过 1%。另外，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对城镇化贡献率第 1 期为 0.19%，但第 10 期增长为 27.34%，说明旅游化对城镇化的助推作用会在较长时期内反映出来，印证了旅游化作用显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 53 个沿海城市 2001—2019 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时空演变轨迹，并借助 PVAR 模型探讨了旅游化和城镇化互动响应关系及区域差异，结论如下：(1) 研究期内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整体水平逐渐上升，但区域发展呈现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化已成为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战略导向。2001—2010 年是沿海城市旅游化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长三角沿海城市脱颖而出，旅游化整体水平超越珠三角沿海城市。另外，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虽然有不同程度增长，但是整体水平较低。2011 年以来，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已经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前期旅游产业实践逐渐显现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综合效应。长远来看，旅游化将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2) 研究期内旅游化热点区域、重心位置空间格局发生变化，长三角沿海城市成为我国区域旅游化重心。沿海城市旅游化演变轨迹呈现为热点区数量先增加后减少，分布走向向东偏移，同时旅游化整体重心向上海方向转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长三角沿海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成为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高高集聚区，而如何发挥其热点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内陆城市旅游化则是当前和未来上海、杭州等沿海城市肩负的重要使命。(3) 旅游化自身发展惯性较强、受城镇化影响较小，但旅游化对城镇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从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可见，环渤海和长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和城镇化互动响应较为密切，城镇化对旅游化影响逐期显现；泛珠三角沿海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仅存在单向互动，旅游化发展惯性强，对城镇化推动作用更显著。整体而言，我国沿海城市旅游化主要依靠自身惯性作用稳步推进，受城镇化进程影响较小，但同时旅游化蕴含的发展潜力和辐射作用将在较长时期内对城镇化建设产生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大。

4.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为提高沿海城市旅游化水平整体提升,应破除行政壁垒,制定跨区域旅游化发展战略。具体来说,以长三角沿海城市为核心区域和连接带,向南向北辐射扩散,带动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城市旅游化水平提升。同时,以沿海城市为示范带,深入影响和推动内陆城市旅游化进程。(2)优化旅游业产业结构,加强空间集聚和区域旅游合作。旅游化对城镇化推动作用明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可借助旅游业发展契机促进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同时,旅游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集聚也将内化为推动旅游化进程的持久动力。(3)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推动旅游化发展。就沿海城市而言,各城市旅游化基础不同,面临着不同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有效的旅游化发展战略。旅游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旅游化综合效应的显现也将是个漫长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变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旅游化完善城市建设,带动新型城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沿海城市作为我国战略核心区域,深入推动旅游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打造宜居宜游城市空间和人文氛围对于区域乃至全国发展具有持久意义。

参考文献:

- [1]Young B.Touristization of Traditional Maltese Fishing-farming Villages:A General Model[J].Tourism Management,1983,4(1):35-41.
- [2]Jansen-Verbeke M.Tourismification of Historical Citi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25(3):739-742.
- [3]钟沈军.旅游化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J].旅游学刊,2018,33(10):3-5.
- [4]张广海,王新越.“旅游化”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新四化”的关系[J].经济管理,2014,36(1):110-121.
- [5]王德刚.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6-64.
- [6]周小凤,张朝枝.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J].人文地理,2019,34(3):154-160.
- [7]陈志钢,保继刚.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3):65-70.
- [8]张广海,刘真真,王新越.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及预测[J].生态环境学报,2013,22(5):792-800.
- [9]夏赞才,张苏兰,李典友,等.美丽中国建设和区域旅游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5):724-728.
- [10]王坤,黄震方,余凤龙,等.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J].旅游学刊,2016,31(5):15-25.
- [11]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等.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8):1297-1309.
- [12]唐鸿,刘雨婧,麻学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2):216-223.
- [13]钟家雨,柳思维,熊曦.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4,34(2):187-192.

-
- [14]麻学锋, 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J]. 旅游学刊, 2012, 27(3): 36-42.
- [15]麻学锋, 刘玉林.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8, 38(8): 1346-1356.
- [16]王新越, 刘二恋, 候娟娟.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1087-1094.
- [17]胡付照, 曹炳汝.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旅游发展格局的影响[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6): 113-118.
- [18]张广海, 赵韦舒. 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PVAR 模型分析[J]. 经济管理, 2017, 39(11): 116-133.
- [19]刘佳, 陆菊, 刘宁. 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的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J]. 资源科学, 2015, 37(12): 2381-2393.
- [20]刘佳, 张俊飞. 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收敛性分析——基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7, 33(7): 867-872.
- [21]冯正强, 易振新. 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动态关系检验: 基于面板 VAR 模型[J]. 财会月刊, 2017(30): 101-106.
- [22]王成武, 郭敏臣. 基于旅游地域系统和 GIS 的旅游化水平测度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S2): 76-81.
- [23]王新越, 秦素贞, 吴宁宁. 省域旅游化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J]. 经济地理, 2014, 34(4): 179-185.
- [24]武娜, 沈镭, 钟帅, 等. 晋陕蒙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时空耦合关系[J]. 经济地理, 2019, 39(9): 17-23.
- [25]鲁宜苓, 孙根年. 山东省旅游重心的演变及驱动机制定量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7, 33(6): 754-758.